

澄明精神处境的抒写

——吴大康小说集《狗男人》的文化解析

雷升录

(安康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在现代文化中,传统日渐为媚俗和视觉传媒方式所取代,心灵精神被大众文化及大众群体放逐到了蛮荒之地,精神在城市喧嚣的物欲中萎缩,无家可归、心志恍惚成为现代都市人精神的基本样态,寻找失却了的乐园,为漂泊的心安个家,就成为现代文化探寻的向度之一。吴大康的小说集《狗男人》正是通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呈现现代人迷离中的精神处境,并力图将这一处境置于澄明的境地。

关键词:吴大康;《狗男人》;文化解析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024X (2009) 06 - 0013 - 03

人类的生存自从脱离了生物学水准而走向精神化历程之后,精神就被规约向文化的形式性轨道发展,作为人类生存精神直接呈现方式的小说文体,从其产生,就以其与人类生存具有同一性的优先性承担着将人类精神规约向文化范式的使命,但随着现代都市文明的崛起和大众文化的产生,人类的精神日渐为媚俗和物欲所放逐,精神在小说中的地位也在浮世烟花中萎缩,无家可归成为现代精神的基本处境。如何重新构筑起人类精神的家园,就成为现代小说努力探索的向度。吴大康的小说集《狗男人》就是力图为迷离中的现代精神处境,构筑一个可以供心灵栖息的家园。

—

吴大康对现代人生存精神的探索,从其介入小说创作一起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在这部小说集中,我们能够明确地感觉到他这一探索方式上的变化与发展。这部小说集给笔者最明显的感觉是他的小说语体方式在改变。在他的前两部小说集《我们曾经相爱》和《世界尽头的一丝光明》中,其语体基本是翻译语体。从话语角度看,翻译语体的语言更多地体现为介质性的,是符号和工具,语言发挥着评介与解释的功能,语言呈现的不是本体意义。也就是说,语言与生存处于分离状态,语言仅是承载思想意识的工具,还无法达到建构精神世界、显示生存意义的层面,未能实现语言与存在的同一。在《狗男人》这部小说集中,他的叙述语体已完全汉语化了。他竭力让思想意识在语言中变得明晰,语言也自然就成为生存的直接现实。像《秋雨》中“我”和秋雨初次相聚

分别时的话语:“相聚的时间不算很长,有一点淡淡的遗憾!记得从酒吧出来后,我想骑车送她,她说不用啦,街上人多呢。我细细地品味人多的意思,就看见她转过身,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的臀部很圆,富有弹性,不过腿有点轻微的罗圈,走路的姿势也不太好看。”这与其说是写秋雨给他的印象,倒不如说是作为网友初次见面后,秋雨给“我”的是网友相聚意犹未尽的心理失衡感。

这部小说集给笔者的另一感觉是“思”的浓度强化。他前两部小说中已渗透出一个学者型作家特有的“思”,但更多的是诗人气质的感悟与体味,激情远远大于哲思,或者是“思”尚未上升到文化理性的层面,仅是对某种现象的直观判断,并没有把这一现象纳入更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来思考,进而作出价值判定。而在这部集子中,他明显地以现代文化理念为背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我们民族数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予以审视。在他的每篇小说里都可感到这种文化理念的存在,也可看到西方文化的参考坐标。读他的作品,我们可随处感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等人的存在,也可感到余华、苏童的存在。这一审视在《另一个过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第三个感觉是,虽然这部小说集和从前的小说一样,基本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在以前的小说中,第一人称意味着写自己的精神历程及生活周遭的小世界,而这部集子中,“我”的象征意味强化了,“我”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出生于 60 年代,生存于当下中国,心灵精神处

收稿日期: 2009 - 09 - 01

作者简介: 雷升录 (1962 -), 男, 陕西合阳人, 安康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文艺学、西方文学。

于不安骚动状态下的知识分子。于是第一人称为自我心灵的显示提供了有利的途径,这一个“我”不再是私人化或半私人化写作中的个体自我,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蕴。无论是谋杀贾平凹的“我”,还是追寻爱情、逮老鼠或是画画的“我”,都不再是生活于自我狭小天地的自我,而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对狭小自我的消匿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意义。一个人的写作,倘若仅是限于自我,那就只是表现,表现是连动物都会有的本能。文学是传达,是要写出人们共通的、也是为受众所认可的东西,就像舞台表演的歌唱家,这是以人类审美原则为基本规范的。走出自我,小说才获得了它本身的意义,艾略特所说的诗歌写作是消除自我的,这一原理同样也是适用于小说的。

二

小说作家按其创作动因来说,大约可分为四个不同的级次:思想型作家,他以其独特的思考,探究着生存现实的困惑及矛盾,在对民众精神进程的关注中,进行着文化启蒙;文化型作家,是在传统写作意义上,传承着小说这一文体方式,坚守着传统的正义、邪恶、善良、理想、真与美等价值观念,传达着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市场型作家,是为文学创作产业化,求得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创作群体;媚俗型作家,无论是媚政治、经济、网络、时尚话语等等,都是追求人生效益最大化的写作群体。在这四种不同的创作群体中,大康是属于思想型的,虽然他的创作还带有更多的私人化色彩。

大康小说的鲜明特征是整体意向反叛性(反叛精神是人的心灵精神的制衡机制),这一反叛性植根于其“思”的内容,在笔者看来,其创作的思想性大致集中表现于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样态、精神处境的揭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是人性、人的精神,还是人的生存,倘若经历了极度的抑制、困缚,那它在后来的匡正中,必然会是由一种扭曲转化为另一种畸形。这就好像青春少年时风流成性,珠老花黄时矢志守节的妇人,她是无法回归到正常人的心态的。经历饥谨、贫困、抑制、忧伤等多种磨难之后的中国国民,在温饱正解决,精神相对自由、生存无大的威胁的情形下,却体味到了生的悲凉。于是,他们在没有丰富物质支配的条件下,走向了极度的奢侈,在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背景下,都追逐着现代享乐,因而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交杂在一起,撕裂着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精神,就像《秋雨》中的秋雨,《双梦记》、《狗男人》中的“我”一样,骚动、不安、迷离,似有所求又无所求,清晰又恍惚困惑等一系列矛盾构成他笔下人物基本的精神状态。生存于这种

状态中的心灵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吞噬着,正如一个能够欣然接受男女之间自由性交往的理念的女学生,却不能承受与自己钟爱的情人自由分离一样,现代或后现代都是一个系统理念,连同观念与行为,你不可能接受一个而否弃另一个,就像你买西瓜,不能只买瓜瓢不要皮一样。

其次是对人性的思索。探讨人性自古以来就是文学始终承担着的使命,一种文学还不能在人性探讨的层面上展开,那它就不可能回归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来。文学对人性的探讨,一方面是追寻解析我们不确切的人类心灵精神处所蕴含的基本意义,另一方面自然是丰富、充实着这种心灵,为人类心灵精神赋予文化性内涵,同时也在冲突、消解他种文化形式对心灵精神的抑制与阻遏。在《秋雨》、《双梦记》、《狗男人》、《苍蝇》、《另一个国度》、《从水中出来》、《勾引者手记》等篇目中,都浸透着这一主题。《秋雨》中秋雨喜欢和“我”玩却拒不上床意味着什么、《狗男人》中狗与“我”对话中的“我”在狗眼里是什么状态、《勾引者》与自己妻子的被人勾引又指向什么等等,这一切都指向了对人性、人的心灵精神的探讨。

再次是消解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始终是把人置放于宇宙中心,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因而人成为他者存在合理性的依据。这种极端的人类自我中心,几乎导致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灭绝,也将人类生存的世界渐化为非人的。大康的小说中,《老鼠》、《苍蝇》、《黄鼠狼偷鸡》都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抗击。在人类眼中,老鼠之所以要捕,原因只有三个:一是吃粮食;二是打洞;三是给人传染病。试想一下,老鼠不吃粮食吃什么,不打洞难道盖房子,人类又把多少病菌传染给了老鼠?至少在人类开垦土地之前,那荒原也是老鼠的家园。在人类飞机飞升以前,天空早就就是苍蝇的领空,这到底是谁抢占了谁的生存空间?

对媚俗文化的抗击与拒斥,体现了作家特立独行的文化个性。在《我是如何谋杀老贾的》中,这一意识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媚俗”既是大众文化的也是商业文化的,它的致命的诱惑力在于他的煽情性与麻醉性,它在消弭人的生命活力,扼杀生命的激情与生机。肥皂电视剧、流行歌曲、无聊的娱乐都具有这种特征。在文本中,老贾是作为一个文化象征出现的,他只是媚俗文化的一个符号,作家通过对他的谋杀,从自我心理上实现了对这种文化的拒斥与否弃。

爱欲的恣意抒写是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作家对生命的颂歌。在诗人眼里爱欲是生命激情与生机的呈现。爱欲是当代文化最显著的一个表现主题。无论是在娱乐文

化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爱欲表现及宣泄都已构成它们的基本内容。爱欲在当代是指男女之间一种以感官享乐为基调的愉悦身心的审美活动，是生活审美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是人的肉体 and 感官解放的基本标尺。在这种欲念里，男女间的关系再也没有爱情的纯粹与亮洁，但也不是色情的低俗，而是一种健康无害的公益活动，虽然它也是现代商业化营运的结果，但它符合人性，且与人类的文明指向是完全一致的。爱欲产业应该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发展最迅猛的产业，从服饰、化妆、整容、娱乐文化、影视、网络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度，处处都渗透着这一印痕。大康小说中大多篇目都与这爱欲相关，这在根本意义上应该是基于他的诗人气质。《秋雨》、《狗男人》、《从水中出来》、《勾引者手记》等，就是这种泛化爱欲的集中呈现。没有爱欲，诗人自然就如同被弃置在荒野中的鱼，满怀激情地热切肯定这一欲念的合理与自然，正传达出诗人内在的生命欲求。

最后是对现代叙事方式的探索，表现了作家特殊的现代性意识。现代生活自然要求具有现代性的叙事话语与叙事方式，大康这部小说集的每一篇都是新的叙述方式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大康探索了变形、幻化、梦幻、象征、隐喻、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错置、虚构、元小说、仿拟、印象叠加等多种现代和后现代叙事方式，以呈现当代生活及多样化立体式的心灵精神世界。《另一个国度》中的幻化与梦幻，《狗男人》的寓言、内心独白与隐喻、象征，《双梦记》中梦与现实的交织，《勾引者手记》对克尔恺戈尔的仿拟，《我是如何谋杀老

贾的》的元小说意味与虚构，《老鼠》、《苍蝇》、《从水中出来》等篇中的隐形叙事角色与现代神话色彩，都充分体现出现代叙事方式的探索历程。他在现代小说意识背景下，对现代叙事方式兼收并蓄，力图通过现代叙事方式，展现现代知识人多元化的立体型精神状态，并竭力使这一精神走出混沌与迷离，上浮到文化层面，进而达到心灵精神的澄明境地。应该说他的表现方式不仅是新颖的，同时也是较成功的。

参考文献：

- [1] 吴大康. 狗男人 [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2] 克里斯特娃. 爱情传奇 [M]. 姚劲超，姜向群，戴宏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
- [3] 刘小枫. 陈小明. 阅读的德性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4] 罗森斯托克-胡絮. 越界的现代精神 [M]. 徐卫翔，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 杨雁斌，薛晓源. 重写现代性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6] 奥托·F·贝斯特，沃尔夫冈·M·施莱德. 吻 [M]. 朱刘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7] 罗伯特·F·墨菲.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M]. 王卓君，吕迺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刘小枫. 现代困境中的审美精神 [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Comment on the Book—the God Damned Man

LEI Shenglü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 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Chinese tradition is in the replacement of popular and eye-stricken media. The secret soul of man is left to the wilderness; it is losing its family in the cities, just like Adam and Eve lost the Paradise. So, to find a home, for the soul, in the cities has become the orientation. The novel—the God Damned Man—revealed the social puzzlement, and tried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trap.

Key words: Mr. Wu Dakang; The God Damned Man; cultural probing